

社科文献  学术文库

| 文史哲研究系列 |

# 转型时期的 社会与国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TRADE ASSOCIATIONS IN MODERN CHINA  
UNDERSTANDING SOCIETY AND STATE  
IN A COUNTRY UNDERGOING TRANSITION

(修订本)

朱英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  学术文库

| 文史哲研究系列 |

# 转型时期的 社会与国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TRADE ASSOCIATIONS IN MODERN CHINA  
UNDERSTANDING SOCIETY AND STATE  
IN A COUNTRY UNDERGOING TRANSITION

(修订本)

朱英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  
历史透视 / 朱英著. -- 修订本. -- 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8.9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201 - 1755 - 5

I. ①转… II. ①朱… III. ①商会 - 商业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3326 号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修订本)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著 者 / 朱 英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陆 彬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43 字 数：57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755 - 5

定 价 / 2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说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三十年来，特别是1998年二次创业以来，秉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和“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定位，社科文献人以专业的精神、用心的态度，在学术出版领域辛勤耕耘，将一个员工不过二十年最高出书百余种的小社，发展为员工超过三百人、年出书近两千种、广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并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经典是人类文化思想精粹的积淀，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作为出版者，也许最大的安慰和骄傲，就是经典能出自自己之手。早在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就开始筹划出版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全面梳理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希望从中选出精品力作，纳入文库，以此回望我们走过的路，作为对自己成长历程的一种纪念。然工作启动后我们方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文库入选图书的具体范围、入选标准以及文库的最终目标等，大家多有分歧，多次讨论也难以一致。慎重起见，我们放缓工作节奏，多方征求学界意见，走访业内同仁，围绕上述文库入选标准等反复研讨，终于达成以下共识：

一、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学术精品的传播平台。入选文库的图书

必须是出版五年以上、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精品力作。

二、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主要呈现社科文献出版社创立以来长期的学术出版积淀，是对我们以往学术出版发展历程与重要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文库也收录外社出版的学术精品。

三、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从学界认识与判断。在遵循一般学术图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文库将严格以学术价值为取舍，以学界专家意见为准绳，入选文库的书目最终都须通过各该学术领域权威学者的审核。

四、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的基础，只有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交流与传播，学者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切磋琢磨、砥砺学问，共同推动学术的进步。因而文库要在学术规范上从严要求。

根据以上共识，我们制定了文库操作方案，对入选范围、标准、程序、学术规范等一一做了规定。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收录当代中国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理论著作，分为文史哲、社会政法、经济、国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等五个系列。文库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包括专著和主题明确的文集，应用对策研究暂不列入。

多年来，海内外学界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成长提供了丰富营养，给予了鼎力支持。社科文献也在努力为学者、学界、学术贡献着力量。在此，学术出版者、学人、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恳切希望学界同仁和我们一道做好文库出版工作，让经典名篇，“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启迪后学，薪火不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8月

#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怀德	马敏	王延中	王名	王国刚
王建朗	王巍	付子堂	邢广程	邬书林	刘庆柱
刘树成	齐晔	杨光	李友梅	李平	李永全
李扬	李向阳	李林	李国强	李剑鸣	李培林
李景源	李强	邴正	吴大华	吴志良	邱运华
何德旭	张宇燕	张异宾	张蕴岭	陆建德	陈光金
陈春声	林文勋	卓新平	季卫东	周弘	房宁
赵忠秀	郝时远	胡正荣	俞可平	贾庆国	贾益民
钱乘旦	徐俊忠	高培勇	唐绪军	黄平	黄群慧
曹卫东	章百家	谢寿光	谢维和	蔡昉	潘家华
薛澜	魏礼群	魏后凯			

## 作者简介

朱英，1956年生，湖北武汉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并应邀赴美、加、法、澳、日、韩、新加坡等国出席学术研讨会和讲学。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商会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项目以及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专项课题；出版《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等多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200篇。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 内容提要

在清末至民初的重要转型时期，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而且相互之间一度建立了某种新型互动关系，对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本书即以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社团为主要考察对象，从一个侧面透视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及其新型互动关系的具体影响。在清末诞生的商会虽仍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传统色彩，但其契约性自治规则、近代民主原则，以及相对独立之经济职能、“司法”职能、政治活动、报刊舆论工具等，明显反映出不同于传统旧式商人组织的近代特征，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新发展；而商会之所以能够诞生并具备这些自治权利，又与清末民初国家推行的改革举措，尤其是对民间社团的大力扶植与支持密不可分，从中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国家”的重要改变与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政治改良也提上议事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民间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依稀可见近代市民社会的雏形。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未能得以长期维持，加之社会自身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近代中国始终无法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无从根本改变一以贯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更难以使近代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发展之路。



# Abstract

The period spann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was a time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hat saw unprecedented changes to both “society” and “state”, and new ways in which the two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d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China’s transition toward modernity.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tries to understand both these developments and their social and historical ramifications by looking closely at the role of trade associations, an emergent typ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While China’s earliest trade associations,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late Qing, retained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trade groups, they were also clearly distinct from these insofar as they were committed to self-governance based on contractarian principles, to modern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engaged in activities in areas such as economics, the “judiciary”, politics,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These organizations provided a window on how civil society evolved and grew in modern China. Bo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e associations at this time and the considerable measure of autonomous self-rule they were allowed to enjoy owed a great deal to reform policies that had been designed to suppor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se policies help illustrate the important changes the “state” was undergoing at this time and their effec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existential and other crises China

was then facing, such mutually-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made possible the burgeoning of fledgling capitalism, put progressive political reform on the agenda, brought about this is especially notable-something of a “Golden 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governmental sphere to which the earliest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an arguably traced. Unfortunately, those positive developments were short-lived. A functionally mature civil society never came to be due to a host of adverse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 powerful state and a relatively anemic society kept the country off the development path toward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 序 一

章开沅

市民与市民社会近些年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人们多以为是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其实，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史学界早已讨论过与此相关的问题。当时可以争鸣的学术问题真是屈指可数，所以有人讥之为“五朵金花”。其中的一朵“金花”，即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市民和市民斗争。后来这一问题的争执又延伸到太平天国史研究，在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中，也涉及有无市民力量参加及其作用如何等。甚至在另一朵“金花”——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中，不时也出现过有关市民与市民斗争的论述。但是这场讨论为时不久，一是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作为讨论的基础，二是因为1957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变迁，泛意识形态化使仅余的“五朵金花”也迅速凋零，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多少有些回避市民和市民斗争这类提法，而严格保持着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类的经典言论一致。

其实当年那些或多或少肯定市民和市民斗争的学者，主观上也是

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至少是力图用中国历史来印证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正确。但他们（其中也包括少年孟浪的我）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是西方人，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要依据欧洲（特别是西欧和中欧）历史所提炼的某些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实际。平心而论，“以论带史”以及与此相近的毛病，在争论双方的文章中都找得出来。所以多年以后，有些西方学者还在说我们是“眯着眼睛找资本主义萌芽”，而国内史学界却几乎已将40年前这场不大不小的争论遗忘了。

我很羡慕现今活跃于国内外史坛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基础上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们再也不会“眯着眼睛找资本主义萌芽”，更不必担心被扣上什么“反对×××思想”之类的政治帽子。他们只要愿意潜心于切实的学术研究，便可以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参加任何新学术领域的讨论。当然，也不应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些论著至少可以提供一些资料线索和研究思路，即便是错误也可使现今的研究少走一点弯路。

据我多年的了解，朱英研究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这一课题，具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十余年来，他从整理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着手，一直坚持从事商会研究，不仅发表有关论文近20篇，而且出版专著两部，已在国内外商会研究领域处于先进行列。这些年西方学者讨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众领域颇为热烈，有肯定其存在者，也有否定其存在者。但我发现争论双方都很少涉及商会问题，更谈不上认真利用商会资料。这是由于《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上、下册）和《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出版较迟，他们还来不及认真阅读和充分利用。也有些美国学者，由于感到中国学者（主要是大陆学者）在商会研究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便转而寻找其他有待开发的文献资源（如人事档案、民事诉讼档案等）。然而无论如何，研究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不论其有无）而忽略商会档案的利

用，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因此，像朱英这样长期坚持商会研究并且掌握大量商会原始资料的学者参与讨论，一定可以使有关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切合中国国情。

反过来说，探索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问题又可以拓宽商会研究的思路，使汗牛充栋的商会资料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近代中国商会一经诞生，便极力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期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会档案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但由于数量既多而且零散，估计已被利用者不过20%~30%而已。记得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当即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关注。但也有一家报纸以轻蔑的口吻批评我：“对若干商会档案的研究，据以说明全盘结论，那是很大的缺陷。”我相信，当时这位批评者没有也不可能认识这批商会档案的真面目，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进过天津档案馆和苏州档案馆的大门。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批商会档案可以涵盖清末民初社会的全盘，但不能不指出，在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全盘性问题时，如果不认真研究商会档案，那才是“很大的缺陷”。毋庸置疑，朱英的这部新著，将从新的角度再一次显示商会问题的重要和商会档案的价值。

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过去研究不够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诚然是腐朽而又残暴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救却又不得不采取某些顺应时势的政策措施。在近代商会创办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就曾起过积极的主导作用，因而本书作者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眼，采用了“扶植”、“倡导”、“保护”等正面词语。历史表明，当时如果没有清朝商部和各级政府的倡导，各地商会就很难如此迅速建立并且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但是，商会势力的增长与活动空间的延展，又必然或多或少冲击固有的统治秩序，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作为旧体制的国家便难免又要对新兴的商会加以种种限制乃至压

抑。不过，由于晚清中央政府的腐败和权力日益下移，商会仍能在各种限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由此便引发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如果属于良性互动，则国家（政府）和社会两获其利；如果属于恶性互动，则两受其害，将形成对抗、冲突，引起激烈动荡，乃至一方消亡或两方俱亡。历史学家的职业分工，限定他们主要是解释过去而不是预言未来，但只要是把握历史的真实，探索具有终极意义的课题，并且尽量给以合理的诠释，便有可能对现实与未来提供某些借鉴。朱英在本书出版以后，将与他的同事一起继续研究近代中国官、绅、商、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涵盖面更宽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将国家只视为专政的工具，而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有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在近代中国，官、绅、商、学是极为活跃而又影响极大的重要角色，研究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探索其发展流变，检讨其优劣得失，并且给以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新的丰硕成果。

历史是已经打上句号的过去，但史学则是永无尽期的远航。真正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自满，因为他们的航行永远没有尽头。

鼠年之春于武昌桂子山新居

## 序 二

邓正来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研究的主要讨论，若从支配性的解释模式转换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居支配地位的，乃是“传统的停滞的中华帝国论”；第二阶段的支配性论点形成于对第一阶段的论点质疑的讨论中，它认为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始终处于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变迁之中，其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近代早期经历相类似。当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两个阶段的支配性模式的转换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传承过渡性质的理论解释模式。

在第一阶段持续的讨论中，论者立基于不同的问题结构而大体上形成了三大学术解释模式。简而论之，一是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以 E. Balazs 为开端，继而为西方诸多汉学家（包括较早在西方接受训练的一些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士绅社会”解释模式。该模式基本上认为，中国拥有一个在文化上同质的精英，即所谓的士大夫，他们同帝国紧密勾连，因此这一统治阶级具有一种不曾断裂的延续性（the uninterrupted continuity）；<sup>①</sup> 而他们所具有的种种保守性质，也使他

---

<sup>①</sup> 参见 J. W. Esherick & M.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2-5。这里所说的较早接受西方训练的中国学者主要是指瞿同祖、张仲礼和何炳棣等，相关研究的中文文献可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等等。

们成了阻碍中国实现技术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终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这种解释模式显然是以马克斯·韦伯的中国观为理论资源。<sup>①</sup> 二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中国学派”所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解释模式。这种模式以传统与近代截然两分的近代化理论为依归，<sup>②</sup> 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因此，只有经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在回应这种冲击中逐渐摆脱困境，获得发展。<sup>③</sup> 三是中国史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解释模式。此一模式主要以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为理论基础，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无变化的状态；明清生产方式的特征乃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这种生产方式阻碍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sup>④</sup>

---

① 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中华帝国静止观”，可参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三联书店，1987。韦伯在将中国与西欧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力图理解中华帝国，虽说获得了很多成就，但他未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工业的现代化。

② 对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中传统与近代二元观的讨论和批判，较为精要的分析，详参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W.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 - 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③ 关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阐释，参见 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费正清等人的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依据该模式进行的研究，详参 Mary Clabaugh Wright（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以及 P. Clyde 与 B. Beers 的 *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 1830 - 1965*, Prentice-Hall, 1966。对相关研究的评论，参阅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第55~57页。

④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第132~133页。具体观点也可见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上述第一阶段关于“传统的停滞的中华帝国”的论断，由于种种原因，在各自的学术脉络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批判。最早对上述论断提出质疑的，可能是中国史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初便提出而于80年代又有发展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点。这个解释模式认为，中国社会在明清时期并不是停滞的，而是充满着种种资本主义预兆的变迁，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相类似；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逻辑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后才被打断的。<sup>①</sup>“哈佛学派”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则在60年代末期首先遇到了政治上的批判，此后又在两个向度遇到了史实及理论的挑战和批判，并被所谓“近代早期”的解释模式起而替代。例如，他们指出了明清时期人口大量增长、物价上涨、经济上渐增的货币化趋势以及农村社会中经济竞争增多等事实，基本上可以与西方近代早期的发展等而视之。同时一些西方论者也从理论上批判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所依据的传统与近代截然两分的近代化理论，指出了这种外向型模式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sup>②</sup>然而，对于所谓“士绅社会论”的批判，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做出的，随后由西方学界所提出的“地方史的研究进路”（approaches from local history）扩展并拓深。这些论者通过把关注点从国家控制或国家精英地位转移到地方社会的精英面相，指出了中国的精英尤其是地方精英并非只是所谓的士绅，而更包括那些依地方活动及财富等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商人及地方强人等竞争性精英，而这些多种类型的精英间的变迁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说明了近代中国精英并非那种同质

---

① 参阅曾景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以及《历史研究》编辑部和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均载宫明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第1~30、111~135页。

② 这方面的论著，参阅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